

教科书与近代教育

王 余 光

19世纪中,我国封建社会走到了尽头,鸦片战争爆发后,社会形态发生了广阔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从社会经济到社会政治,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到社会文化。其中,西方教育形态的输入,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形成,旧教材的丢弃,新式教科书的产生,正是这一变化所带来的结果。

在我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和新式教科书产生之前,传统的教育制度使用的教材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启蒙识字性质的,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幼学》等;另一种是应科举考试的,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等。这些教材都是文言文写成,文字艰深,儿童读不懂,知识面窄,内容陈旧。再加上当时的教学方法简单,背读时间多,讲解时间少,学生“一定要花上七八年的工夫,读得烂熟了,再由老师开讲,然后才渐渐地明白一点字义跟章句。至于圣贤的大道理,往往读了一辈子读到老死,也读不出甚么来。”^①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而教科书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中国唐宋以来,教材千年没有更新,朝朝代代,教育陈陈相因,人们的思想囿于过去那些“圣贤的大道理”,教育不能在更新的文化层面上开展,又如何能培养出一代精英!中国传统文化 的停滞不前,由此可见一斑。

当中国遭受外来冲击,经济、政治乃至国家命运发生危机的时刻,这个民族才深感到需要有新的人才,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因此,传统教育制度和过时的教材,在时代滚滚的大潮中,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了。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影响,科举制度不得不废除,新的教育制度逐步建立。一些比较明智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教育文化的影响,在各地设立学堂,并改进或废弃原有的教材,编印新式教科书。于是,新式教科书开始在中国萌芽。考察整个近代教科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后到20世纪初,是近代教科书的产生阶段,教科书仍然使用文言文,内容有所更新;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是近代教科书的发展阶段,教科书改用白话文,内容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 鸦片战争以后,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一面传教,一面设立学校,开办教育。教会学校逐年都有发展,1877年,教会学校学生有5975人,至1920年,学生达245049人。^②20世纪初期我国的一些知名大学,如齐鲁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等,都是传教士创办的。随着教会学校范围的扩大,西方文化教育制度开始对我国旧有的教育产生影响。

教会学校初期开设的主要课程有语言、地理、历史、数学、自然科学和宗教。为了统一编写教科书,1877年,在“益智会”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专门负责编写和出版学校教科书工作。当时编成的宗教方面的教科书有《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

《圣道问答》等,供初等小学生使用,供高小使用的有《福音史记读本》、《旧约史记读本》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教科书主要有狄考文的《笔算数学》、《形学备旨》、《代数备旨》,傅兰雅的《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学》、《格致须知》,潘慎文的《八线备旨》,艾约瑟的《重学》等。作为传教士所编写的教科书,除宣传一些科学知识外,宗教的内容必然成其最主要的部分。正如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1895年的《中国教育名录》中所说:“这些书编成之后,无疑地必然会被本地学生和人民所采用,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些书除了严格的科学性外,应当抓住各种机会,注意到上帝、罪恶、赎罪这些大事。”

1887年以后,在华传教士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大量出版图书。广学会的会员中有林乐知、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都能用中文著书,介绍西学。当时广学会编印的历史、地理、科技、伦理、宗教等书,多为学堂作为教材使用。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为培养与外国联系的翻译人才,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随后又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广州设立同文馆,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家办理的新型学校。

京师同文馆1862年设立,开始仅教授英文,次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后陆续增设天文、算学、德文、日文等馆。1876年,同文馆规定学生学习期限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八年毕业;二是年岁稍长,仅借译本而求诸学,五年毕业。学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汉文、翻译练习等,这是关于语言方面的;科技课程有代数、几何、微分积分、机械、航海测算、力学、水学、声学、气学、火学、光学、电学、生物、医学、化学、天文测算、地理矿冶等;文法方面的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万国公法、富国策等。^③由此看来,同文馆不仅是一所外国语学校,而且也是一所科技、管理学校。

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大多是教师和学生编写或翻译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担任英文、国际公法等课的教习,他译有《万国公法》、《公法便览》等书,都是同文馆国际法的教科书,此外还著有《格物入门》、《格物测算》、《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等书。化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辑译有《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教科书,又译有《拿破仑法典》,编有《法华字典》;医学和生物教习、英国人德贞辑译有《全体通考》、《药材通考》、《生理学》等书。据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所记载,同文馆翻译的书籍,有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自然、自然地理、历史、法文英文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外文指南等,这些书大多作为教材使用,同时也免费分发给全国的官吏。

1863年,上海设立广方言馆,这也是一所与北京同文馆类似的外国语学校,1867年并入江南制造局。馆中学生分上下两班,初进馆者先入下班,学习英、法文及算学、代数学、对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学习优秀者入上班,学习冶炼、铸造、机械、汽车绘图与驾驶、航海、水陆军事、外语和风俗国政。1905年,广方言馆同制造局内的工艺学堂合并,定名为兵工专门学堂及中学堂。当时学堂的教材有师生自己翻译的,亦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聘用英美等国教士所译的。学堂开设的课程以科技为主,翻译的书亦以科技为多,如《格致须知》二集,《代数学》六本,化学书等,都曾作为教材被上海、南京等地学堂采用。

在近代20世纪以前这一段时间,我国学堂、私塾还是以传统的教材为主,虽有部分学堂采用以介绍西学为内容的教材,但这些书都是在华传教士翻译或编写的,有很多宣传教义的内容,不适合我国学校使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一些先进学堂开始自己编写教科书。

(二) 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中国官僚开办阶层开始创办新型公立普通学校,以培养政治和科技人材。1897年,盛宣怀于上海开办南洋公学,所开设的课程有政治、数学、化学、物理、工

艺、机器、制造、矿冶诸学。当时教师深感传教士编译的教材不适合中国学生学习，于是开始自编教材。南洋公学师范院师生首先编出《蒙学课本》三编，铅字印行。此外又有《笔算教科书》一种、《本国初中地理教科书》二种。这是我国自编教科书的开始。

1898年，俞复、丁宝书等人在无锡创办三等学堂，当时在学堂任职的部分教员，每日编国文一课，经过五年，共编成七编，名叫《蒙学读本》，前三编以一些常见浅见的事物为内容，引起儿童读书的兴趣，间及中外史地、物理等知识。第一编以识字为主，书后附有“字类备温”，便于学生复习。第二、三编每课后，还列有问题，以启发学生思考。第四编专重德育，用《论语》弟子章分纲列目，系以历史故事，作为修身课本。第五编专重智育，采辑子部喻言为内容，每课系以问答。第六编注重作文修辞。第七编选《史记》、《汉书》、诸子及唐宋名家的文章。全书由浅入深，并附有文法和教学法，内容很全面。此书初由上海文澜书局印刷，用楷书石印，并附有插图，装帧非常美观，载明为“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蒙学读本》一经出版，就很受各学堂欢迎，出版后不及三年，就重印十余次。1902年，俞复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又将《蒙学读本》重印。同时发行教科书多种，如陆基《蒙学经训修身》，宋树人《文法》，丁宝书《中国历史》，张相文《中国地理》、《外国地理》，董瑞椿《珠算》，丁福保《心算》、《笔算》、《卫生》、《生理》，钱承驹《天文》、《地理》、《地质》、《格致》，华循《动物》、《植物》、《矿物》，周柏年《化学》，丁锦《体操》等，共数十种，总称“科学全书”。在当时出版教科书的书局中，要算文明书局出版发行的教科书最为齐备了。

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次年，京师大学堂依据该章程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将学堂课程分为16门，各门之下列有教材若干种，供学堂采用。这16门课程为：修身、伦理、字课、作文、经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算学、名学、理财、博物、物理、化学、地质、矿产等。这些课程的开设比之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了很大的进步，许多自然科学作为学生必学的知识。在这个书目中所列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虽有一些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但大多数都是译自国外。应当看到，传统的修身、伦理、经学等课仍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弟子职》、《曲礼》、《朱子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五经》、《十三经》等仍作为教材，要求学堂使用。

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作为管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关。次年，学部设立图书局编译教科书。在部编教科书未成之前，先取各家出版的教科书加以审定，以备各学堂之用，于是颁布了《教科书审定办法》，并公布了初小高小暂用教科书目录。这个审定办法的主要内容有：(1)图书皆须有著者名、出版年月、价值、印刷、发行所，方加审定。(2)审定之图书，初小准五年内通用，高小准四年内通用，通用期满后，再加改良，仍可呈部再加审定。(3)审定之图书，准标明“学部审定”字样，未经审定伪托者，应行查办。(4)有挂图及教授法者兼审之。(5)纸质须坚韧，字形须清朗。(6)以书精价廉者为合格，学生用书合计五年，多者以五、六元，少者以四元为准，以求教育普及。根据这一审定办法，一些教科书被批斥查禁或以为无庸审定者，如瞿方梅的《中外地舆歌》等，不合教科书体例，梅光鼎的《中国医学教科书》等，则为非教科书，周文治《蒙学镜》，分科未妥，尚有缺点甚多。俚语满幅、方言太多、详略不宜、用语甚杂、深浅不合、记事不实、算式不符、辞不达意者，均遭学部批驳。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出版教科书最多的一家出版机构。该馆成立不久，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事务，为商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务在近代近五十年间(本世纪初至1949年前)，出版教科书是工作重点之一，五十年出版的教科书，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师范、职业学校、补习学校、民众识字班等各类教育用书，可谓应有尽有。

有。商务印书馆富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有一批才华出众、深孚众望的编辑人才，如张元济、蔡元培、蒋维乔、庄俞等人，皆为一代名流。他们不仅编辑教科书，而且还编配一些补充教材，以供教学参考。以儿童教育方面为例，早在民国以前，商务印书馆就出版有《儿童教育画》、《看图识字》等用文字和绘画相结合的彩印刊物，此后陆续编印各种儿童丛书及单行本。到1950年元月止，就有1551种，2402册儿童读物出版④。

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出版，培育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著名作家冰心说：“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⑤周谷城1913年在长沙第一中学读书时，使用的大多是商务出版的教材，他后来回忆说：“只要是教科书，无一不是商务印书馆编的或译的。即此一端，已足证商务印书馆对中国之现代化的功绩。至于较高一点的专门学问或大学用书，无论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应用科学或理论科学，几乎通通是商务印书馆译的，或编的，或著的。以丁文江为首、以顾颉刚居末的几十位专家任编委所编的大学丛书，形式内容都是现代化的”。⑥

商务在编辑教科书之初，就成立了编译所，从事编辑教科书事务。早期编辑所由蔡元培、张元济先后任所长。1902年，清政府颁布学堂章程，商务据此章程首先编辑成《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一册，后陆续编成十册。除国文外，还有格致、算术、修身、笔算、珠算入门、地理六种。在初小教材以外，还编有最新高小教材一套，其中有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算术、珠算、修身、农业和商业共九种。最新中学教科书包括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十一种，总称为《最新教科书》。与之配套的还有教授法十种，详解三种。

在《最新教科书》之前，《蒙学课本》和《蒙学读本》都不按学制，不详教法，只能说是近代教科书的雏形。商务印书馆这套《最新教科书》，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研究，并按一定的教学法和学制编译而成。这套最新教科书的出版，不仅适合了当时兴学的需要，而且后来对学制的确立、新式教科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最新教科书》内容多，所选的材料也太深，学生使用负担过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于1910年，在《最新教科书》的基础上编印了一套内容减少，文字比较浅显的教科书，即《简明教科书》。该书对《最新教科书》作了不少改进，文字较前者浅显，材料力求合于儿童心理，较多地采用韵文、应用文及复习文，出版后颇受用者欢迎。

（三）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宣告结束。民国的建立，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影响很大。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宣布废除前清颁布的学堂章程，并公布《审定教科图书暂行章程》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各种教科书需合共和民国的宗旨，前清学部所颁布及民间通行教科书中有关清及旧时官制避讳抬头等字样，应逐一更改，教员遇有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中小学、师范一律废止读经。有关教科书的审定办法，规定主要有：（1）中小师范学校用教科书，须经本部审定；（2）须合于部定学科程度及教则者；（3）送审之图书，本部认为应行修改者，签示于书上，发行人应照签修正印成后，再行呈验，核定后方作为审定图书；（4）凡已经审定之图书，遇事实内容有不宣之处，本部飭令修改者，应于三月内改正送部备核，逾期失效；（5）审定有效期间，为六年；（6）发行人须于有效期间届满前六个月呈请重新审定。

这样，原先的教科书都不能适应新形势了，于是，出版家们蜂拥而起，展开了一场编印教科书的竞争。

就在民国建立之际，中国另一大民营出版家中华书局诞生了。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

在政治和经营方面都很有远见，并对教育和教科书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曾与丁福宝合编过《文明国文教材》、《文明修身教科书》、《文明算术教科书》，并写有《论我国教科书》、《论中国教科书史》、《论中国教科书史书》、《论各国教科书制度》等论文。1908年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陆费逵是同盟会成员，预料辛亥革命会成功，教科书必有大的改革，于是与沈知方等知己秘密编辑教科书，筹资组织新的书局。

1912年初，中华书局成立，陆费逵在《中华书局宣告书》中称：“国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接着便出版秘密编辑的教科书，计有《修身教科书》、《算术教科书》、《新制初小国文教科书》、《中学英文文法教科书》、《中学经济教科书》、《师范用中华伦理学教科书》、《心理学教科书》等，总称《新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文字虽然比较艰深，但适合当时的政治局势，因而很快就被教育界采用。民国以前，商务印书馆几乎垄断了教科书的出版，但所出版的教科书仅适用于帝制时代，民国成立，这些教科书全被废弃，新编又为时较长，只好汲汲将原先各书修改，时逾半年，方能勉强出版，而教科书出版的上风已被中华书局所占。

在近代，中华书局是与商务印书馆并驾齐驱的一家大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该局成立的第二年，范源濂任编辑长，相继编出新制教科书多种，其中有《新制初小教科书》、《新编初小教科书》、《新制高小教科书》、《新编高小教科书》、《中华高小教科书》、《中华中学教科书》等。此后，各种名目的教科书不断出版发行。在中、小学教科书外，该局还出版过师范教科书和《大学用书》。中华书局在编印各种教科书的同时，很注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14年创刊了《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1922年又创刊了《小朋友》，1926年出版了《小朋友画报》。此外还出版了《中华学生界》、《少年周报》、《中华少年》和《初中学生文库》等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在这些少年儿童读物中，以《小朋友》的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大，历时最久。它不但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和重视。^⑦

此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适时势需要，又相继出版了《共和国新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制教科书》、《实用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虽文字较浅显，但都是用文言文编成，仍不适合低年级学生使用。新文化运动崛起后，文言文教科书开始发生变革，白话文教科书的产生，把我国近代教育和近代教科书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四） 辛亥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进展还没有能够震撼封建旧文化的根基。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命令尊孔读经，一些封建买办统治势力也大力提倡“保存国粹”，企图加强旧思想对人们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与旧文化思潮针锋相对，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随着西学的输入和科技的进步，文言文越来越不适用，尤其在儿童教育方面，白话文作为编写教材的工具，意义更为重大。白话文明瞭易懂，读写都容易，不必费翻译的功夫。因此，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就在其所办的小学里，自编白话教材，教授儿童。1905年，杭州彪蒙书室印行一套《绘图四书速成新体白话读本》，作为教科书。该书的解释全用白话，并附有插图，可以说，这是白话文在教科书中的最早使用。该书遭到清学部的排斥，未能流行。后来，中华书局编印《新式教科书》，于文言课中加入一两课白话课文，但大多数教科书还都是文言编写的。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的运动达到了高潮，此时胡适等人又提出推行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也不得不提倡使用白话文。1919年，北京教育部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使用白话文，并颁布新式标点符号。次年又令国民学校文言文教科书分期作废，

逐渐改用白话文。至此，小学文言文教科书渐渐归于淘汰。

教科书使用的语言的变更，是近代教科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不仅使教科书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对其他白话文书籍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此外，教科书是教育的工具，白话文教科书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最先用白话文编写教材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在小学教科书方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白话文《新体国语教科书》，后又有《新法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出版了《新教育国语读本》。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儿童读物也都改成白话文，这不能不对中学教科书有影响，因而商务印书馆于1919年又出版了用白话文编写的中学教科书，这就是《白话文苑》。这套书急于求成，内容很粗糙，但全是白话文编写，并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提行分段，因此也流行一时。

30年代，我国大学教育发展迟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本国编写的教材。当时西方原版图书价格昂贵，非一般大学生经济力所能及，因此商务印书馆决定编辑一套《大学丛书》，以供国内大学生之用。1932年，商务印书馆邀集国内各大学及学术机关代表，组织《大学丛书》编委会，规划出书计划，分请专家编辑各院各系用书，借以促进我国大学教育和学术的独立。这套丛书先后出版约三百余种，各学科的用书均初具规模。在此前后，言行出版社，南京正中书局，中华书局，贵阳文通书局，大夏大学等单位都出过一些大学用书，其规模都不及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194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后来由三联书店继续出版。这套丛书先后出版近20种书，收进了许多进步学者的著作，如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等。

教科书采用白话文编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就其内容和形式上看，初期白话文教科书仍然很不完善。教科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仅就小学教科书看，五四以后，小学教科书虽然都用白话文编写，但其文章的体裁都是一些说明文，枯燥乏味，很不适合儿童阅读。此时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因此有人建议把一些轻松有趣的故事编进教科书，如煤炭的对话，水的自述等，这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开始。到1921年以后，儿童文学达到了高潮，小学国语教科书也就把儿童文学作为中心了。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教材、新教育，世界书局的新学制教科书，也都以儿童文学作为国语课本的主体，课本中采入了童话、寓言、笑话、故事、传说、儿歌、民歌等不同体裁的文章。别的教科书如历史、地理等，也有人主张加入文学的体裁，但当时并没有完全做到。儿童文学作为小学国语课本的主体，这是教科书在文章体裁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便利学生更快地掌握知识。

在教科书的思想内容方面，初期教科书中封建思想的修身自洁、忠君保皇的内容占了主导地位。民国成立以后，这些不合民国宗旨的思想被革除，教科书中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有所增加。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文化教育开始严密控制，教科书也就成了他们控制青少年学生思想的工具。

随着近代教科书的发展，教科书在文章的组织形式上也逐步完善。早期教科书中课文与课文之间没有什么关联，30年代以后，教科书在组织形式上开始注意课文与课文之间的联系。就课文来说，除了正课以外，还有附课，附课的内容有的供儿童增写补充，有的供儿童选择答案，有的指导儿童画图、上颜色、剪贴等。这不但要儿童去动脑筋，还要儿童去动手。

在一些自然常识的教科书里,列有启发儿童思考的问题和搜寻材料的方法,课文之后也附有做实验的方法。这样的教材能使儿童手脑并用,提高了教学效果,这也是教科书走向完善的又一步。

教科书具有持久而广阔的市场,出版教科书不失为一种营利的事业,因而各出版家争相出版教科书,这种风气从民国初年大概一直延续到1936年。二、三十年代,书商出版教科书竞争很激烈。据记载,民国以后,商务印书馆盘并了当时教科书业的劲敌中国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盘并了文明书局,于是教科书营业已完全为这两家所垄断。1921年,原中华书局职员沈知方脱离了中华书局,以三千元资本所办的广文书局扩展为世界书局,并利用赠送书券的办法吸收“读书储蓄”一百余万元,购置机器,建立工厂,编印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争夺市场。世界书局盘并了广智书局、东亚书局、进化书局和古书流通处,于1925年在上海设立总厂,其分局亦已遍布全国各主要城市。其推销教科书除给发行业以优厚的手续费外,更降低批发折扣,并用钢笔等作为礼物,贿赂教育界和学校负责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共谋抵制,合资四十万元另办公民书局一所,编印小学教科书一套,专门对付世界书局。凡世界书局教科书推销地区,公民书局不惜跌价出售,定价一角之书,可以卖到二分三分,至于其他拉笼手段当然应有尽有。可见当时教科书市场竞争之烈。^⑧193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化教育的控制,厉行“国定教科书”的规定,根据其修正课程的标准,各教科书受到审定并全部出齐。至此以后,出版家竞争出版教科书之风才算减弱下来。

纵观近代教科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到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自己编写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教科书体例的不完善到比较完善,教科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出版家总是拿出最强的编写力量、最新的印刷技术,从事教科书的编印事业,使教科书在书业中一直起着领先作用。教科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其他图书的出版,同时也加快了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

注释:

- ① 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载《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
- ② 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页384,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 ③ 据《同文馆题名录》1879年刊、《清会典》卷一〇〇、《中西闻见录》第20号。
- ④ 据《商务五十年》,商务印书馆编印。
- ⑤⑥ 分别引自《商务印书馆九十年》,页312,页415,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 ⑦ 参见李侃《中华书局的七十年》,载《出版史料》第1辑。
- ⑧ 参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268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本文责任编辑 何天齐)